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8~6

2018 年 11 月 20 日

梵高为何自割其耳？

—— 心理传记学中的解释多样性问题¹

威廉·麦金利·鲁尼恩

人格心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人类个体的行为进行解释。举例来说，文特森·梵高曾经将自己左耳的下半部分切下来送给一名妓女。对他的这种行为，目前有很多种解释。这些解释中是否有一种是正确的，还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正确，抑或是它们根本全部都是错误的呢？我们又是如何才能对这些观点作出判断呢？我们将对此事件进行研究，以探究在将人格理论应用于活生生的个

¹ William Mckinley Runya: “Why Did Van Gogh Cut Off His Ear? — The Problem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in Psychobiograph”。王鸿刚译，摘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理论精翻研讨班”青年课题组：《层次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最初刊登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1981年，第40卷，第6期，第1070~1077页。

人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其后，我们还将阐述并批判性的评价那些不同种类的解释性猜测，以作为部分的——虽然不是全部的——对解释多样性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

1888年12月23日，星期日的夜晚，35岁的梵高切掉了自己左耳的下半部分，并把它带到了一家妓院，送给一名叫做雷切尔的妓女，并告诉她“细心保管好这件东西。”

如何解释这件特别的事情呢？多少年来，人们提出了很多解释。下文将对诸多种解释进行反思。这些解释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这些解释之中有没有一种是惟一正确的？还是所有的解释都是正确的？抑或它们全都不正确？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出判断？我们研究这个实例，就是为了探讨在生命研究过程中的解释多样性问题，² 并对不断丰富心理传记学研究的逻辑推理和方法论有所贡献。³ 以下的讨论将试图说明，在将人格理论应用于实际个体、历史人物、研究主题或是临床病人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² 奥尔波特：《人格的样式与成长》、《来自珍妮的信》；霍根：《人格理论：人格学传统》；默里：《人格中的解释》；鲁尼恩：〈作为理论定向的生命过程：人与环境互动的次序〉、〈对生命的另一种解释：一种认识相对主义的观点〉、〈对生命过程的阶段状态分析〉；怀特：《生命研究》、《进化中的生命》。

³ 例如，安德森：〈心理传记学的方法论〉；克罗斯比：〈评估心理历史学的解释〉；埃尔姆斯：《政治人格》；杰多：〈心理分析自传学的方法论〉；乔治：《动力心理学在政治传记中的一些应用》；格拉德：《心理传记学的贡献》；伊曾贝赫：〈心理历史学与思想的历史〉；利夫顿、奥尔松：《心理历史学中的解释》；麦克：〈心理分析与历史传记〉；马兹拉什：《睡椅上的克莱奥：心理历史学序论》；麦耶尔：《对心理分析学对传记的贡献的一些反思》；鲁尼恩：《生命的历史》。

解释的多样性问题

1. 关于梵高行为的一种解释是，他那一段时间内在两件事情上遭遇了挫折：他所深爱的弟弟提奥同一个女人订了婚；以及他没能同保罗·高更建立起工作和生活关系。这些挫折感所引发的不可遏制的冲动首先发泄在高更身上，但随后他自己也成为发泄的对象。⁴

2. 第二种解释是，高更的出现勾起了梵高的同性恋倾向，由此产生的冲突造成了梵高的自残。根据这种解释，耳朵是一种生殖器的标志。⁵

3. 第三种解释则用恋母情结来说明梵高的行为。当时梵高和高更同住一间房子，据高更说，在梵高割耳的前一天，梵高曾经用一把剃须刀威胁高更，但在高更的怒目相向之下，梵高又跑开了。根据这种解释，高更代表着梵高所痛恨的父亲；在最初的威胁没有奏效的情况下，“梵高最后将对父亲的那种特别的仇恨转向了对自身身体的仇恨。这样，梵高便通过对自身的残害，在空想中完成了对他父亲的侵犯，同时也通过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对自身这种侵犯行为的惩罚”。⁶ 然后，“通过把他的象征性器官留在妓院，他同时也实现了占有其母的梦想”。⁷

4. 另一种解释则称，梵高受到了他曾经在阿尔（Arles）看到的斗牛表演的影响。在斗牛表演中，斗牛士都得到牛的耳朵作为奖赏，斗牛士将他得到奖赏向公众炫耀，并将这个牛耳送给他选择的女人。这种解

⁴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

⁵ 荷兰的俚语中“耳朵”一词也代表“阴茎”，梵高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自我阉割。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韦斯特曼·霍斯汀：《梵高的心理发展》。

⁶ 施尼尔：《耀眼的太阳：对梵高的心理分析学研究方法》第 153 页。

⁷ 施尼尔：《耀眼的太阳：对梵高的心理分析学研究方法》第 153、154 页。

释的支持者 J· 奥利维尔说：“我绝对确信，梵高对这种场面的印象极其深刻……梵高切掉了耳朵，他自己的耳朵，象征着他同时征服了公牛，他自己似乎成了那个胜利的斗牛士。这是一种处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心理”。⁸ 然后，就像斗牛士一样，梵高将自己的耳朵送给了他选择的女人。⁹

5. 在梵高自残的前几个月，当地报纸上大约有 15 篇文章报道了关于杰克 — 一个杀人碎尸者 — 的故事。他经常残害妓女的尸体，有时候是割掉她们的耳朵。“这些犯罪行为有很多人效仿，梵高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作为一个受虐狂而不是一个虐待狂，他最有可能做的是将杰克的这种行为逆而行之，将自己的耳朵切下来送给一个妓女”。¹⁰

6. 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经济上，梵高都要依靠他的弟弟提奥，并且经常同弟弟一起过圣诞节。然而，这一年，梵高得知提奥要和未婚妻一家一起过圣诞节。一种解释认为，梵高的自残是吸引他弟弟注意力的一种无意识的策略，也是一种把弟弟召回身边照顾自己，而不是同他的未婚妻一起过节的方式。

7. 梵高曾在他自残前不久画了一幅一名妇女在摇篮的作品，洛宾斯便是他的模特。他对洛宾斯一家非常喜欢，并且可能对她们的孩子所受到的爱和注意力感到嫉妒。通过自残，梵高可能希望得到这种象征性的父母的照顾和关爱。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洛宾斯女士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但洛宾斯先生在梵高自残的当晚便来到梵高身边，并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照顾着他。

8. 梵高对妓女抱有深深的同情，并把她们看作是被社会遗弃的人。

⁸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58 页。

⁹ 接下来的解释，除非另有说明，都来自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的复杂分析。

¹⁰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59 页。

一种解释认为，他的自残是他对妓女地位的看法的一种反应。“六月，也就是他自己自残的前几个月，他曾经写过，‘妓女就像屠夫案子上的肉。’当他对待自己的身体就像对待屠夫案子上的肉的时候，他就将这种角色倒转了过来，将自己当作妓女，并对她们给予了同情”。¹¹

9. 梵高感到他的母亲将他看作一个粗俗的人，一个坏孩子。在他自残的那段精神崩溃的日子里，那种原始的象征性的思维过程促使梵高切掉了自己的耳朵，以此博得他母亲的正面评价。“因为梵高有一种无意识的思想，认为突起的东西是一种男性和攻击性的象征。将耳朵的突出部分切掉，或许可以告诉那个象征着他的母亲的妓女，他并不是一个富有攻击性的和有害的男性，他并不是一个不受母亲喜欢的粗俗的坏孩子，而是一个无助的、可以被看透的受害者”。¹²

10. 在梵高患精神病期间，他很有可能经历了十分可怕的、他曾经在某次被攻击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类似的幻听。此后，在疗养院中他写道，他和其他的病人都听到了奇怪的人和物体的声音，他由此推断，这可能是由于他的耳朵的神经出了毛病。所以，在一种疯狂的状态中，梵高可能感觉到他的耳朵出了毛病，并为了摆脱那些让他心烦的噪音而切掉自己的耳朵。

11. 在《圣经》中蒙难地客西马尼，西蒙·彼得切掉了马尔休斯——一个高级牧师的仆人——的耳朵，就是他抓住了耶稣。这一幕印在了梵高的脑海里。他曾经在1888年的夏天试图用作品将其描述出来，并在10月给姐姐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个想法。在极度兴奋中，梵高极有可能模仿蒙难地的场面，既扮演了受害者的身份，也扮演了侵犯者的身份。

12. 另一种解释是，梵高将自己看作十字架上的耶稣，把伏在死去

¹¹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169页。

¹²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173页。

的耶稣身上痛哭的圣母玛利亚看作梵高的母亲。“通过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交给雷切尔——他母亲的替代者——梵高象征性地重演了耶稣蒙难的一幕”。¹³

13. 文森特·梵高一直生活在他死去的哥哥的阴影之中，他的哥哥也叫文森特，刚刚出生就死去了，一年以后，画家文森特·梵高出生了。有人认为，梵高的母亲并不喜欢梵高，而是继续念念不忘她那个死去的完美的儿子。梵高的自残“代表一种象征性的死亡，展示了其母亲所深爱的印象中的死去的哥哥。作为一个礼物，切下来的耳朵就像一个孩子，一个死去的孩子。这样，他既能够重新体验他和母亲结为一体的愿望，也是对他的母亲总是念念不忘她死去的儿子的一种嘲弄”。¹⁴

如何对待解释的多样性？

上面是有关梵高为何要切掉自己耳朵并把它送给一个妓女的心理动机的 13 种解释。此外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更多的解释。¹⁵ 同时，关于梵高的躁动行为还有很多生物学方面的解释。¹⁶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多样性的解释呢？他们都是正确的吗？或者他们当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抑或是他们全部不正确？这些不同的答案是彼此相互冲突，以至于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其中一个答案，那么他就必须抛弃其他答案？还是很多解释彼此相互补充？是否存在一些能够取代所有上述解释的其他

¹³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79 页。

¹⁴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82~183 页。

¹⁵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纳格拉：《梵高：一种心理研究》；施奈德：《心理分析与艺术家》；施尼尔：《耀眼的太阳：对梵高的心理分析学研究方法》；昂特迈耶：《现代社会的缔造者》；韦斯特曼·霍斯汀：《梵高的心理发展》。

¹⁶ 门罗：《梵高的心理轶事》；查尔波特：《文森特·梵高》。

解释？我们是否可以最终理解梵高的行为，从而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不同的人对这件事的反应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从一种观点来看，将梵高的一个单独事件同他生活中的很多思想、内心冲突、象征性物体和无意识的愿望与行为联系起来，其结果将极其错综复杂。“超决定论”认为，一种行为会有非常典型的各种原因和意义，而上述这些材料便可以看作是对梵高行为的补充解释。例如，鲁宾 1972 年在讨论了多种可能的解释以后认为，“所有这些解释可能都有正确的地方。一个人行为的动机既包括被人们所熟知的表层因素，也包括那些当人们遇到时会强烈抵制的深层和纷乱的因素。”从“超决定论”的立场看，对于任何一种人类行为，如果只找出一个单一的理由，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种以上的原因和意义。从另外的观点看，鲁宾声称，“梵高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浓缩到这一个事件上”，¹⁷ 我们所获得的其实是一整套“相关的”解释。¹⁸

理解这些解释的第二种方法是需要注意到，在这些不同的解释之中，有一些是来自于范围更宽广的事件的某些特征或方面的。例如，对耳朵的选择或许和梵高对斗牛表演的观察有关联，这一事件发生在圣诞节或许和将耳朵作为礼物有关联，他选择将耳朵送给一名妓女可能同当时对碎尸者杰克的报道有关。然而，很多种解释都只注意到这一事件中相近的一些方面。他选择耳朵同他对斗牛的观察、报纸上对碎尸者杰克的报道、耳朵作为生殖器的象征有关、可能由听觉神经紊乱引发的幻听以及他对蒙难地那一幕的思考等等。

第三种方法则是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这些解释当中有一些是正

¹⁷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55 页。

¹⁸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82 页。

确的，而另外一些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对这些解释进行严格的考察以确定他们的相对可信性。“超决定论”所认为的心理事件都有多种解释和意义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但认为所有的解释“都会最终成为一个整体解释便是一种将严肃的思考也整个丢掉（的错误做法）”。¹⁹ 如果出于治疗疾病的目的，那么尽可能挖掘一件事情的原因或许还是有用的，但如果出于科学或解释的目的，就必须用批评的眼光考察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进而考察其他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彼此补足或相互冲突。

第四种方法是这样一个思路，即所有这些事件象征性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武断的，而且可能是一种绝望的武断。如果仅仅通过被考察的事件和先前事件或经验的相似性便可产生各种解释理论的话，那么，事件之间的联系就有点太容易被发现了，并且可能的（或者是似是而非的）解释的数目或许会无限膨胀。²⁰ 可能会有人认为，解释的过程太过松散和灵活，以至于它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也包括同它截然相反的事件，而且这种解释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还可以包括很多不同的方式。如果把这种批评说的婉转一些，那就是，心理动力学的解释过程可能具有非常完美的合理性，但在对特定事件的解释中，它的应用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和限制。

对解释性猜想的严肃评估

这个事件非常有力地提出了几个有关心理传记学的基本解释逻辑问题。对生活事件的多种解释存在着，或者说可以显示出何种过程？对于一个特定事件或是生活中的一系列特定事件，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我们

¹⁹ 希尔施：《解释中的合法性问题》第 164 页。

²⁰ 斯彭斯：《临床解释：对证据的本质的评论》第 377、379 页。

是否拥有一套“好的”解释？梵高的事例非常有用，就是因为它通过列举出尽可能多的可能解释，并对每一种解释提供证据，促使人们比通常做出更多的解释性思考。由此，它以异乎寻常的明晰性提出了关于解释性假说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对这些假说的严肃评估问题以及在这些多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或整合问题。

按照波普尔的理论，²¹ 在猜想和反驳之间作出区分以及在提出一个解释和对解释进行严肃的评估之间作出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梵高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猜想过程的极好的例子，同时也被看作是一个极好的展示对这些猜想进行反思的过程。试想一下，就拿那个认为“梵高的行为有可能受到当时报纸上有关碎尸者杰克的报道的影响”的假说做例子。这个假说依赖这样一个假设，即梵高在当时的报纸上读到了这些报道，他注意到在 15 篇报道中有两篇提到了割耳朵这一事实，这种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并且影响到他那天晚上割掉耳朵这一行为。这一解释依赖于一系列假设，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假设具有直接的经验支持，这使这种特定的解释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相比之下，他受到斗牛士那一幕影响的可能性或许会更高一点。²² 因为他在信件中提到了他曾经在阿尔勒参加过斗牛活动。有证据表明，他至少见过斗牛的场面，并且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然而，我们却只能假设认为梵高曾经读到过关于碎尸者杰克割耳朵的报道。

再让我们试想一下关于他把自己的身体看作“屠夫案子上的肉”的那个理论。“妓女就像屠夫案子上的肉”这句话出现在 1888 年 6 月他割耳前几个月的一封信中。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这件事情在时间上更加接近梵高割耳，那么我们基本上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它在梵高的自

²¹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²² 虽然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它的可信度仍然很低。

残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恋母情节解释的部分证据似乎也存在问题。高更直到事情发生的 15 年以后才说梵高曾用剃刀威胁他；事实上，在事情发生四天以后高更在向他的朋友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在梵高割耳以后，高更随即便离开阿尔勒去了巴黎。因此，里瓦尔德以为，高更可能是担心自己行为失当，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来为自己在梵高处于危机之时离开做辩护。²³

不过在另外一种解释中，昂特迈耶认为，梵高“切掉了自己的耳朵，并把它献给了一个他和高更曾经见过的妓女。切下来的耳朵是一件圣诞礼物，因为妓女曾经嘲笑梵高的耳朵长得太大了”。²⁴ 这种特定的解释，也有几个理由对其进行怀疑。据我所知，并没有证据表明妓女曾经嘲笑梵高的耳朵长得太大了。然而，在诸如梵高的信件、高更的论文集以及查尔波特或鲁宾所著的梵高的传记中虽然详细记载了梵高割耳的情节，²⁵ 但并没有提到这些高度相关的环境因素。此外，在记述此事件的同一段落里，至少还存在两处对事实的错误描述。虽然可以假定昂特迈耶书中的 92 处有传记性质的描述是类似查尔波特这样的其他学者所不知道的，尽管查尔波特花了 50 多年的时间研究梵高，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支持这种假说，而且似乎这种证据就是为了制造出一个看似可信的解释而刻意编造出来的。类似的怀疑也适用于麦耶尔·格雷费的解释。²⁶ 他认为，那位妓女曾经向梵高索要五法郎的硬币，但是遭到了梵高的拒绝。随后妓女又说，“如果他不能给她五法郎的硬币，

²³ 里瓦尔德：《从梵高到高更的后印象主义》。

²⁴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235 页。

²⁵ 查尔波特：《文森特·梵高》；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

²⁶ 麦耶尔·格雷费：《梵高：对其传记的研究》。

那么至少要将他的大耳垂割下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她”。²⁷

有一种解释，其基础并不在于那种虚无缥缈的论据，而在于梵高在进入疗养院的几个月后曾说，可能是因为耳朵的神经出了毛病，所以他和其他的病人都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和语言。这种看法可能对他割耳的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

可能惟一有充足证据支持梵高精神崩溃解释性因素就是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弟弟的照顾。尤其是，割耳事件和后来的两次精神崩溃是同他得知提奥订婚、结婚和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消息一同发生的。在每一件事情中，梵高都担心失去他主要的情感和经济的支持，因为提奥有可能将他的爱和金钱转移到他新组建的家庭中。²⁸

梵高的事例似乎也能说明他在遭遇挫折和失去关爱的时候，表现出的一定的性虐待倾向。1881年，梵高曾经拜访了祺·沃斯的父母，祺·沃斯是他深爱的一个女人，但这个女人拒绝了他。当他听到祺·沃斯为了躲避他而离开家的消息后，梵高将“手放在灯的火焰上说，‘我会一直把手放在火焰上，一直等到她回来。’”²⁹ 祺·沃斯的父母吹灭了灯，告诉他根本无法见到她。这些其他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梵高的自残行为可能是受到他得知他将失去弟弟的关爱这件事情的影响。

对诸多解释分出好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由于历史事件的可用证据受到的限制，有时候直接验证每一个假说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我们仍然有能力辨认错误的假设并收集具有确定性的相互支持的证据。对解释和说明的评价可以遵循以下标准：**a.**逻辑合理性；**b.**对于某一事情的诸多复杂方面，其解释具有全面性；**c.**他们接受反证的适应能力，

²⁷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163页。

²⁸ 查尔波特：《文森特·梵高》。

²⁹ 查尔伯特：《文森特·梵高》第79页。

比如说其前提和结论都必须经受得起考验；d.它们在大量相关的证据面前具有一致性；e.它们必须获得上述标准的支持，或者他们同有关人类机能的基本知识和被考察人员的基本情况保持一致；f.他们相对于其他假说的可信性。³⁰

对于每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和对它的所有解释看做一个大树。主干代表最初的问题或难题，枝干代表各种推测性的解释，而更小的分支则代表对这些猜想性解释的检验。任何一个单独的解释都附带着一系列检验，每一个检验都将提供一个虽然不是一锤定音的、但却具有部分效应的对假说的证实或证伪。

最后一步是对只有一个枝干的树干的考察，它代表着对惟一一个没有受到检验的假说进行考察。一个全面的解释性考察就像一棵茂盛的大树，包括一系列的假说，同时也包括对这些解释性假说的大量检验。这样一幅大树的图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对特定解释性研究的进程进行评估的框架，并使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而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寻求惟一性的解释

对个体生命行为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经常受到批评，因为它带来的解释太多了。例如，有人曾说，弗洛伊德的个案研究存在的严重缺点就是它总是带来多种解释。³¹ 波普尔³² 声称：“每一个可以想象的案例都

³⁰ 布罗姆利：《日常语言中的人格描述》第八章；切希尔：《心理动力学解释的本质》。

³¹ 利伯特、施皮格勒：《人格：战略与问题》第50页。

³²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可以按照阿德勒³³ 的理论进行解释，或者同样也可以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解释。我简直无法想象有哪一种人类行为不能按照某种理论进行解释。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它们总是对的，它们总是能够得到确认），所以说，这些理论只不过是在其赞成者的眼中才获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的。我开始意识到，这些强有力的支持其实正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所在”。³⁴ 同样地，格根也说过：“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事件是极其丰富和多样化的，因此任何一种理论模板都不可能完全合理地对其进行解释。案例研究只是允许研究者能够自由地寻找事实以支持他或她预先设定的判断”。³⁵

我相信，这些批评者都言过其实，并且是将已经充分准备好的东西应用于尚未完全展开的解释性研究。对任何一件生活事件的解释都是可能的，只不过其解释经常都需要以扭曲或选择性地选取这些证据为代价。我们可以做出任何一种解释性的猜想，但并不是所有的解释都能够经得起认真的检验。在司法程序中，一个有罪的被告在审判过程中的自我辩解，很容易被原告律师的盘问所驳倒。同样地，用一种特定的理论去解释生活的历史，也会经常经不起严肃的检验。例如，乔治三世（Geogre III）曾经一直被认为患有的一种狂躁 — 郁闷型的精神病，而马卡派恩与亨特经过研究表明，他所患的其实是一种卞淋症 — 一种遗传性的代谢紊乱。³⁶ 即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发现一些证据，它们能够为那些理论提供论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对我们所研究问题的充分解释。

³³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

³⁴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35 页。

³⁵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42 页。

³⁶ 马卡派恩、亨特：《乔治三世与疯狂世界》。

对那些解释的内容进行严肃的检验,可以让我们发现其中很多理论的虚假性和不可能性,因此可以将它们排除掉。在理想状况下,这种过程将会产生一个单一性的、论据充分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即便将很多不令人满意的猜想排除掉,仍会剩下一个以上的解释同所有可以掌握的证据相符合。我们有些时候会遇到“很多可能的解释,所有这些解释在理论上都是合理的,而且也有事实作为证据支持它们,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无法说出到底哪一种解释是最合理的”。³⁷

这种问题并不是在每天的活动中都能够频繁地遇到,因为研究我们日常生活所能得到的资源总是很少的,一旦我们得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以后,或者一旦我们的解释能够同流行的正统学说相一致,我们的研究也会随即停止。然而,如果我们对一个问题进行大范围的考察,如果我们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或者如果这个问题涉及相互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可能就会出现多种解释并存的局面。

结论

有人认为,对一件事情进行解释,只不过是一个人理论偏好的武断应用而已。毫无疑问,有时候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任何方法都可能被错误地应用。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有效应用不仅包括同某些证据相符的明确的说明性表述,而且也包括将这些我们认为合理的表述放在所有能够得到的证据那里进行检验,并且将他们同所有其他解释在合理性方面进行比较。在所有不真实的理论解释被排除以后。或许仍然存在不止一个解释同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相符,但这绝不意味着任何一种理论猜想都可以对事实进行解释。

³⁷ 派伊:〈致编者的信〉第53页。

当遇到一些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临床现象时,研究者们有时会特别容易接受最初的心理动机的解释,因为心理动力学可以使先前神秘的事件变得具有可解释性。梵高的例子展示出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因为深入的研究经常能够产生很多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解释。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认为所有的解释都可能正确还是不够的;这种情况还需要我们对另外可能的解释进行认真的检验,并从可信性方面对他们进行认真的比较。

在一些情况下,通过对一系列可能的解释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可以只保留一种解释,放弃所有其他的解释;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最后仍然会得到“大量的”解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同现有的证据相符,并且没有显而易见的办法决定应该在它们之中选择哪一个。看起来,从事心理传记学研究,就必须鼓起勇气在无法对事情进行解释和面对复杂的多种解释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之间进行选择。

即便存在这些困难,对个人生活中的事件进行解释时所出现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因为这些问题人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也是人格学、心理传记学和临床研究中的重要任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一方面在认识论上,我们需要研究在对个人生活事件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一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才能最好地对事件进行解释。

参考文献

G·W·奥尔波特:《人格的样式与成长》,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61年。

G·W·奥尔波特：《来自珍妮的信》，纽约：哈考特，布拉斯&世界出版社，1965年。

J·W·安德森：〈心理传记学的方法论〉，载《跨学科历史期刊》，1981年11月第3期，第455~474页。

D·B·布罗姆利：《日常语言中的人格描述》，纽约：威利出版社，1977年。

N·M·切希尔：《心理动力学解释的本质》，伦敦：威利出版社，1975年。

F·克罗斯比：〈评估心理历史学的解释〉，载《心理历史学评论》，1979年7月第4期，第6~16页。

A·埃尔姆斯：《政治人格》，纽约：哈考特·布拉斯·若瓦诺维出版社，1976年。

J·E·杰多：〈心理分析自传学的方法论〉，载《美国心理分析协会期刊》，1972年21期，第638~649页。

A·L·乔治：〈动力心理学在政治传记中的一些应用〉，载F·J·格林斯坦和M·L·莱纳主编的《人格与政治研究读本》，芝加哥：马卡姆出版社，1971年。

K·J·格根：〈理解人类发展中的稳定性、变化与机遇〉，载N·达坦和H·里斯主编的《终身发展心理学：辩证透视与实证研究》，纽约：学术出版社，1977年。

B·格拉德：〈心理传记学的贡献〉，载J·克努特松主编的《政治心理学手册》，三藩市：杰斯·巴斯出版社，1973年。

C·G·亨佩尔：《科学解释的诸多方面》，纽约：自由出版社，1965年。

C·G·亨佩尔：《自然科学的哲学》，昂格伍德·克利夫：普兰提斯·霍尔出版社，1966年。

E·D·希尔施：《解释中的合法性问题》，康涅狄格州，新港市：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年。

R·霍根：《人格理论：人格学传统》，昂格伍德·克利夫：普兰提斯·浩

尔出版社，1976年。

G·伊曾贝赫：〈心理历史学与思想的历史〉，载《历史与理论》1975年第14期，第139~155页。

R·M·利伯特与M·D·施皮格勒：《人格：战略与问题》，霍姆伍德·伊尔：多尔西出版社，1978年。

R·J·利夫顿与E·奥尔松（主编）：《心理历史学中的解释》，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74年。

A·J·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梵高的心理传记学》，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72年。

马卡派恩、R·亨特：《乔治三世与疯狂世界》，纽约：潘索恩出版社，1969年。

J·E·麦克：〈心理分析与历史传记〉。载《美国心理分析协会期刊》，1971年第19期，第143~179页。

B·马兹拉什：《睡椅上的克莱奥：心理历史学序论》，安康特出版社，1968年，第31、46~64页。

麦耶尔·格雷费：《梵高：对其传记的研究》，纽约：蓝带出版公司，1933年。

B·C·麦耶尔：〈对心理学对传记的贡献的一些反思〉，载R·霍尔特和彼得甫洛德主编的《心理分析与当前的科学》（第一卷），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72年。

R·R·门罗：〈梵高的心理轶事〉，载《神经与精神疾病期刊》，1978年，第480~488页。

H·A·默里：《人格中的解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8年。

H·纳格拉：《梵高：一种心理研究》，伦敦：艾伦·昂温出版社，1967年。

K·R·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62年。

L·派伊：〈致编者的信〉，载《心理历史学评论》，1979年8月第3期，

第 50~53 页。

J·里瓦尔德：《从梵高到高更的后印象主义》，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出版社，1956 年。

W·M·鲁尼恩：〈作为理论定向的生命过程：人与环境互动的次序〉，载《人格期刊》，1978 年第 46 期。第 569~593 页。

W·M·鲁尼恩：〈对生命的另一种解释：一种认识相对主义的观点〉，《传记》1980 年 3 月，第 209~224 (a)。

W·M·鲁尼恩：〈对生命过程的阶段状态分析〉，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1980 年，第 38 期，第 951~962 (b)。

W·M·鲁尼恩：《生命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D·E·施奈德：《心理分析与艺术家》，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50 年。

J·施尼尔：〈耀眼的太阳：对梵高的心理分析学研究方法〉，载《美国意象》，1950 年第 7 期，第 143~162 页。

M·舍伍德：《心理分析学的研究逻辑》，纽约：学术出版社，1969 年。

D·P·斯彭斯：〈临床解释：对证据的本质的评论〉，载 T·夏皮罗主编的《心理分析与当前的科学》（第 5 卷），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76 年。

M·E·查尔波特：《文森特·梵高》，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 年。

L·昂特迈耶：《现代社会的缔造者》，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55 年。

A·J·韦斯特曼·霍斯汀：〈梵高的心理发展〉，载《美国意象》，1951 年第 8 期，第 239~273 页。

B·W·怀特（主编）：《生命研究》，纽约：阿瑟顿出版社，1963 年。

R·W·怀特（第 3 版主编）：《进化中的生命》，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75 年。